

无声的战争

——西方海军谍报史

[英] 理查德·迪肯著



群众出版社

无声的战争

——西方海军谍报史

(英) 理查德·迪肯 著

张志明 唐国强 译

王海涵 施燕华 译

张毅君 校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无 声 的 战 争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179千字
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贵州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62000册 定价：0.68 元

内 容 提 要

此书作者理查德·迪肯是英国一位记者，同时也是一位从事研究并撰写世界各国谍报组织的著名作家。《无声的战争》一书是他论述西方几个主要国家海军谍报工作发展的专著。书中系统地叙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百年间各个历史时期西方国家，主要是英、美、德等国海军谍报工作的发展，着重阐述了密码战、两面间谍、假情报和潜艇战各方面的情况。

目 录

第一章	从相互敌对到中立主义·····	(1)
第二章	潜艇的影响·····	(22)
第三章	谍报组织的开始·····	(34)
第四章	策划战争·····	(50)
第五章	通讯革命·····	(63)
第六章	霍尔海军上将——现代的马基雅维里·····	(85)
第七章	情报和潜艇战·····	(104)
第八章	德国破译英国密码·····	(120)
第九章	假情报游戏·····	(133)
第十章	珍珠港的教训·····	(156)
第十一章	转折点·····	(168)
第十二章	冷战·····	(188)
第十三章	海底情报·····	(206)
第十四章	间谍船——政治战略的工具·····	(215)
第十五章	大洋底下一盘棋·····	(229)
第十六章	大洋上下的监视·····	(242)
第十七章	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展望·····	(255)

第一章 从相互敌对到中立主义

海军谍报工作最初是通过探测而发展起来的。这方面的第一个事例也许是亚历山大大帝下令建造一只用来测量海洋深度的玻璃桶，以便“获取那里的情报”。说来也怪，海军谍报正是从海下作业这个今天起着最为重要作用的领域开始的。当时人们感到，通过水下探索可以取得较多的成果。一位名叫博哈丁的阿拉伯历史学家就记载过，在十字军东征期间，有一个水手依靠一艘水下的船只潜入被围困的普托利迈斯市。而十九世纪英国皇家海军历史学家尼古拉斯·哈里斯·尼古拉斯爵士则谈到十四世纪人们使用过的“水壶帽”，一种供那些进行原始水下侦察人员使用的特殊头盔。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艺术家和发明家列奥那多·达·芬奇绘制了水下战舰的图纸，但是他却将此保密，因为他担心如果人们获得了有关这类战舰的知识，可怕的战争将会变得更加可怕。

西方的海军谍报工作是在英国、法国、荷兰和西班牙争夺西方海域制海权的斗争中无计划地发展起来的，并且主要是由那些国家的特务机关而不是由它们的海军部门组织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时期那位能干而又固执的政治家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使英国在这方面取得了优势。他组织了一个特务机构，并且常常用他自己的钱来维持它的开支。伦敦之所以能够确切地估计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发展情况，应完全

归功于他。尽管通讯联络缓慢而不安全，并且艰苦的破译密码工作常常使工作进展更慢，然而沃尔辛厄姆爵士却通过他在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和葡萄牙设立的情报网，窃取到西班牙海军元帅圣克鲁斯侯爵各种报告的抄本，上呈给伊丽莎白一世女王。这些报告提供了一切人们想知道的有关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情报：舰只的数量和型号、它们的武器装备、人事情况和物资贮备状况。他呈给女王的最后一个文件的标题是：“圣克鲁斯侯爵和巴纳比·德·佩德罗萨将军一五八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上呈给西班牙国王的总报告和具体报告的抄本，含有停靠在各港口的舰只、海员、士兵、贮备物资的清单，以及薪饷和其他开支的详细情况”。沃尔辛厄姆实际上是有组织的现代谍报工作之父，正是由于他坚持给予海军情报工作绝对优先的地位，才使英国免遭入侵。

僧侣——不管是英国国教的还是罗马天主教的——都名列最早的水下舰只发明者的前茅。他们之中的多数人看来都想把这种“船只”作为侦察活动的工具。切斯特的主教约翰·威尔金斯在十七世纪初写了一本题为《数学魔术》的书。在这本书里，他描述了“如何把方舟造成一个能够在水下航行的船……只要稍稍发挥一点聪明才智，这样的船就可以成为皇家海军的耳目”。这只能解释为建议将此船用于间谍活动。十七世纪，博雷利神父设计了另一种水下船只，由带有象鱼鳍一样张合叶片的水下船桨推动。这种船只的一张图片刊登在一七四九年的《绅士杂志》上。该时，这种船的样品已由德文郡的纳散尼尔·西蒙斯制造出来。一六八五年，又有一位名叫西米尼厄斯的耶稣会神父写信给法国国王说，他发明了一种能够升降的船，“可以使全副武装的人，甚至一批

军队，手脚自由地潜入海底，并在海底呆上整整一个星期”。

在这个时期，要是有哪一国的海军造出了哪怕是最原始的潜水艇，那就会大大推动纯粹属于海军的情报工作，甚至可能把陆军的部分政治权力转移到海军手里。但是，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有关海军的谍报仍然主要依赖于文职和陆军的特务机关头子所提供的情况。例如，那时对密码的控制权主要在陆军手里，特别在法国是如此。还是切斯特的那位主教约翰·威尔金斯写了一本密码学手册，再次强调皇家海军比陆军更需要发展密码。

在这几个世纪里，大多数从事谍报工作的海军高级军官主要关心的是那些能够使他们俘获舰只，取得奖励的情报。在克伦威尔时期，布莱克海军上将就是由于得到了一个在牙买加的犹太间谍递送的情报，而在特纳里夫岛俘获了西班牙舰队。这个时期，各西方国家的海军大都是这种情况。海军高级军官宁愿将情报留在自己手里，以便谋取私利。应该转递的情报往往被扣下来为私人进行海上掠夺的目的服务。

一七七〇年至一八〇〇年间，法国海军首脑曾试图建立一个更为彻底的情报系统。不下四个法国人曾设计过潜水艇，然而只有一个人，即波尔多的迪奥尼先生的设计超出了绘图阶段。这些法国人中有一个名叫博吉尼特的想将一艘水下船只开到泰晤士河伦敦桥下，用他的话说，是打算“预先获取有关敌人意图和武器装备的情报”。

美国海军谍报工作的历史是从独立战争开始的。这场战争彻底改变了大西洋两岸对海军谍报工作的看法。美洲的殖民地开拓者完全是白手起家，必须建立某种正规的谍报机构，来对付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英国海军。这个机构开

始由轻龙骑兵第二团本杰明·塔尔梅奇少校奉华盛顿将军之命组建。塔尔梅奇和他手下的军官罗伯特·汤森在耶鲁大学时是同班同学。他们之间的亲切情谊对海军情报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由于汤森住在纽约州的奥伊斯特湾，因此处于观察封锁美国海岸的英国舰队活动的战略要地。

美洲殖民地开拓者的海军情报机构在塔尔梅奇掌管的总情报网中是一个高度专业化和卓有成效的机构。它的代号是“塞缪尔·卡尔珀”。很可能是为了迷惑喜欢刨根问底的同伙，汤森被称为“小塞缪尔·卡尔珀”，而亚伯拉罕·伍德赫尔则称为“老塞缪尔·卡尔珀”。汤森的商店里货物齐全，有很多英国顾客来光顾。他们都受到小心巧妙的盘问，以期得到无意中透露的关键性情报。汤森本人往来于奥伊斯特湾和纽约市之间，而与他保持经常联系的伍德赫尔却呆在塞塔克特。通讯的方法是原始的。消息往往是派人骑马口传的。伍德赫尔的同伙卡列布·布鲁斯特曾在晒衣服的绳上晾出一件黑色的衬裙表示他已在长岛上岸。就是布鲁斯特这位有经验的海员——他熟悉这一带海岸的每一股水流，每一个弯道——提供了大部分有关英国海军活动的情报。他在长岛海湾上下游弋，有时还出海一段距离。大量的材料就是由这位孜孜不倦的能干的观察家收集来的，最后送到了华盛顿本人手里。

这一类情报报告大部分是用隐显墨水写在正常信件的行与行之间的空隙处。很多报告迄今还保存着，特别是在华盛顿的档案里。美国首任大法官的兄弟詹姆斯·杰伊是这种隐显墨水的发明者。他写道：“我用黑墨水给他、他的兄弟、还有他家里的另外一、两个人各写一封短信，每封信不超过

三、四行。剩下的白纸我就用隐显墨水写上我认为有益于美国事业的情报和其他事情。所有这些信件都不封口。”

使用隐显墨水，是因为当时浅陋的密码非常容易被人迅速破译。然而，由于坚持要这个情报网既要搞间谍工作又要搞反间谍工作，它曾不止一次地遭到危险的破坏。这两项工作是很难混在一起的，其结果是汤森不得不终日担心被别人害死。他在一七八〇年十月二十日的一封信中，透露了一些他所遇到的问题。他写道：

当我决定开辟另一条路线时，你会接到通知的。我不愿让你所提到的那个人，或者任何象他那样性格的人来看望我……一般估计上周上船的那支部队是想在弗吉尼亚或是在北卡罗来纳的费尔角进行一次佯攻，来支持康沃利斯勋爵。他们带的马匹很少，马鞍子却不少，其用意是让同他们一起走的一批失去坐骑的龙骑兵骑上马。你收到这封信时，我估计科克舰队和英吉利舰队已经到了。我希望并要求我的所有信件在阅后即予销毁。

小塞缪尔·卡尔珀

一七七一年，缅因州的一个名叫戴维·布什尼尔的美国人首先设计出一种可以配备一枚原始鱼雷的潜水艇。“卡尔珀”情报网极力希望这艘潜艇用于侦察敌人的海运情况，但是他们的意见被军方否决了。军方坚持要这艘“海龟号”潜艇用于同敌人的船舶作战。一七七六年，布什尼尔派遣了埃兹拉·李中士驾驶这艘潜艇去袭击停泊在赫德逊河的英国船“鹰号”。这一企图以失败告终，李自己差点被炸死。

潜艇的建造及其许多早期鼓吹者打算用它来搞的那种情报工作本来是在十八世纪更快地发展起来的，但实际却

并非如此，因为潜艇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卑鄙、懦弱而又不人道的战争手段，所以几乎所有水下舰只的发明者都受到了种种歧视。在美国，根据清教徒的理论，人们不仅把水下船只看作为魔鬼的发明加以反对，而且非常憎恨这种新武器，以致于布什尼尔最后不得不移居乔治亚，并且改名为布什博士。这纯粹是因为他不想同有些人提倡用他发明的潜艇进行战争的一套方法发生任何联系。直到下一个世纪中叶，南北战争的时期，潜艇才终于被视为一种合法的战争工具。

从美国本土指挥海外的海军情报工作的开端，以任命下列海军谍报人员为标志：威廉·宾厄姆驻西印度群岛，奥利弗·波洛克驻路易斯安那（当时是法国领地），本杰明·富兰克林、赛拉斯·迪恩、约翰·亚当斯和阿瑟·李驻巴黎。在巴黎的这几位还在荷兰、法国和西班牙的各港口用了一些助手。为约翰·保罗·琼斯写传记的作家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说，亚当斯和富兰克林两人在巴黎设立了一个海军采购和联络处，这就是美国在欧洲的海军情报处的核心。

如果人们不是某一方的狂热支持者，那么有关这一方面的全部情况至今还是不清楚的，或者说是使人摸不着头脑的。最使人搞不清楚和有争议的是有关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情况。甚至对不偏不倚的现代历史学家来说，他还多少是一个谜。因为，据记载，富兰克林曾宣称，如果没有“有关皇家海军活动的第一流情报”，没有法国作为盟国这样一个有利条件，美国的殖民地开拓者就绝不会赢得胜利。但是，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富兰克林在私下是一个地道的悲观主义者。他暗地里指责包括华盛顿在内的所有美国将领，而且有的时候，他几乎是一个失败主义者。但是，他本人提供了大

量的海军情报是毋庸置疑的，他能够正确地解释他获悉的情况，并将他的解释传递给其他人，这也是无可争辩的。

富兰克林身上有一些特点甚至使最客观的历史学家都对他钦佩不已，因而有时看不见真实情况。在美国历史学家的心目中，富兰克林享有一种华盛顿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这两个人现在都被视为泥足巨人——都比不上的多年不变的福分。但是，尽管听起来可能令人震惊，仍然必须提出一个问题：本杰明·富兰克林是不是英国的秘密特务？艾伯内西在他叙述富兰克林和阿瑟·李之间往往令人生疑的关系时写道：“（富兰克林的）名声如此之大，以致几乎没有一个现代作家敢于对他的行动是否正派提出疑问或者怀疑他的宣言与事实不符。”“历史上这样的做法当然是没有道理的。摒弃对英雄的崇拜，并对当今已获得的全部证据进行仔细研究，就会得出与原有结论迥然不同的判断。”

几年前，几位大学教授为了驳斥关于富兰克林是臭名远扬的“地狱火俱乐部”成员的说法而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工作。“地狱火俱乐部”是曾任英国财政大臣的弗朗西斯·达什伍德爵士创造的一个名叫“威康布的圣弗朗西斯骑士团”的秘密社团的绰号。这些教授未能就此作出任何确凿的结论。然而大西洋彼岸英国方面提出的事实却确证他是这个奇怪的组织的一员，该组织是一个在欢宴作乐的外衣掩护下的英国谍报中心。富兰克林参加这样的组织似乎同他的为人完全不符，否则就意味着他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因为富兰克林这个长老会教徒和道德家，通过参加了这种组织就与一个臭名昭著、放荡不羁的浪荡子成为相交多年的亲密朋友。

“地狱火俱乐部”发源于伦敦，然后迁到库克哈姆和马

洛之间泰晤士河中的一个岛上，后又迁往梅得曼哈姆一个废弃不用的西妥教团的修道院里，最后移到西威廉布教堂所立的那座山丘的一些山洞里。该俱乐部的男成员称为“修道士”，穿各种不同颜色的道服；女成员则称“修女”，着白色道服，戴面具，以隐瞒身分。俱乐部条例规定，“女士们在修道院居留期间，认为自己是修道士们的合法妻子”。富兰克林这样一位严肃的学者竟是这样一个俱乐部的成员，岂非咄咄怪事？一七四五年，他在费城的酒馆里淫猥作乐整整一年，还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美丽的维纳斯神在召唤：应召而来，在美人的怀抱里让昼夜流逝。”富兰克林甚至在七十多岁的时候，还狂热地追求一位年迈的法国财政官员的年轻的妻子布里容夫人。富兰克林的书信文件表明，一七七二、一七七三和一七七四年的夏季，他在西威廉布别墅。意味深长的是，一七七二年七月他去那里逗留了十六天，而每年七月正是弗朗西斯兄弟会各分会举行例会的时候，一般历时两周。

最能确证富兰克林是该俱乐部成员的证据，部分来自他自己的文字，部分来自独立人士。在他写给费城的阿库特先生的信中——这封信未被任何富兰克林的崇拜者引用过——他提到“由勒德庞塞勋爵（达什伍德当时已升为贵族）在威廉布复制得很美的古典图案的精雅，它的构思可能有时显得古怪、令人不解，但是它的优美在地下与地上同样显而易见”。这一定是指山洞。除去俱乐部成员，别人是不准进入这些山洞的。仅此一点就意味着本杰明是俱乐部的成员。

画家吉赛普·博格尼斯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他同富兰克林一起去马洛的一家旅店，店主问道：“这不是富兰克林老爷吗？”

富兰克林回答道：“不，是库克哈姆的本杰明兄弟。”

在该组织的酒账簿上有这样一笔账目：“一七七三年七月七日，库克哈姆的本杰明兄弟：一瓶波尔多红葡萄酒，一瓶葡萄牙葡萄酒，一又四分之三瓶卡尔卡维洛酒。”

法国人感兴趣的是这个组织成员的政治性质。成员中除了勒德庞塞和富兰克林外，有桑德威斯伯爵（海军大臣），托马斯·波特（主计大臣），伯特伯爵（前任首相），还有国会议员约翰·威尔克斯、乔治·塞尔温和巴布·多丁顿。还有一个成员曾当过法国间谍，在英国避难，名叫戴翁·德博蒙骑士，他原来被派往伦敦了解法国入侵英国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巴黎的佩罗小姐是威康布一位“修女”的后代。她作证说，她祖先的日记中透露戴翁是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结识富兰克林的，“富兰克林信任戴翁，并利用他来了解法国政治阴谋中有哪些陷阱，同时还同意向戴翁提供有关法国事务和秘密计划的情报，让他传给英国人”。

富兰克林试图用自己微妙的方法为两个民族——英国和美国殖民地开拓者——的事业服务，这一点到大约一七七〇年为止一直是相当清楚的。在这以后，就有许多故意含混不清的话和相互矛盾的行动。但是，他并不认为这是两面手法，而是视为贯彻他自己关于世界政治的宏图大略，在殖民地开拓者中唯有他能够洞察这一前程。这并非是狂妄，而是认识到他的智力比殖民地开拓者的领导人们要高明得多。富兰克林的宏图大略，是设想一个自由的美国和一个强大无比的不列颠帝国将来是可以共存的。可以说，富兰克林以一种拐弯抹角、有点兜圈子的方式，第一个预见到了大西洋联盟。他喜欢英国的生活方式，有一次他对一个苏格兰朋友坎

姆斯勋爵说，他“早就认为不列颠帝国未来的伟大和安定的基础在美国”。诚然，这一观点在十年中又有所改变，但是他保留了这样的信念，即从长远说，一个强大的不列颠帝国不仅对英格兰而且对美洲殖民地都是最为有利的。

富兰克林是很有远见的，他意识到在今后许多年内，美国需要英国皇家海军的保护，否则，美国很可能会被比英国更为掠夺成性的国家任意宰割。他不论作为平民还是作为外交官搜集情报，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他担心如果允许法国在美洲的无主土地上开拓殖民地，就可能会破坏他自己购置新土地的机会。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在加拿大购置了土地，并敦促英国在西部开拓殖民地，以防止法国人取得更多的领土。

在他的一篇题为《我在图书馆里阅读历史的体会》的随笔里有一段奇怪的话，可以部分说明他不光明正大的行径。他写道：“世界大事，战争、革命等等，都是由那些不管怎样伪装也是出于谋求私利动机的人们领导的，虽然他们也维护了公众的利益。”就是这样，当他宣称“美洲并不寻求独立”时，他却秘密安排将武器走私到美洲殖民地，以便达到他所否认的那个目的。后来，当他公开勇敢地要求无条件独立时，他又同样秘密地不断向英国外交部和特务机关提供不仅是有关美洲殖民地各方面的政策而且是有关法国和西班牙的种种情报。

富兰克林充分意识到，他在巴黎的处境是独特的。如果美洲殖民地的部队失败了，他不会受到责备，英国也不会加害于他。到那时，他甚至可以在巴黎转而投靠英国。另一方面，如果美国人取胜了，他就可以享受到他作为（美国）驻

法国公使所应得的荣誉。这样，富兰克林就从他在帕西的总部继续写信给在英国的政治家、外交家和同他进行合伙生意的商人——谢尔伯勋爵、卡姆登勋爵、戴翁·德博蒙、托马斯·沃波尔、托马斯·沃顿，以及约翰·威廉斯。不仅如此，许多在帕西富兰克林的总部和他家里工作的人都是英国特务机关坚定、积极的成员。

在美国，不断犯错误的英国将军们笨拙地使叛乱变为战争，从而促成了革命的到来。威廉·伊登领导的英国特务机关企图挽救局势，在浑水里倒上一些秘密外交的油，花了大笔款项进行贿赂，以便使局势恢复正常。伊登（后来是奥克兰勋爵）留下了大批文件，证明他的间谍活动是成功的，许多一直被认为是美国爱国志士的人实际上却是英国特务机关的代理人。也许最出乎人们意料的是，美国在巴黎的海军办事处和采购处竟是英国这类渗透的中心，而本杰明·富兰克林本人则是英国人的工具。

在援助美洲的殖民地开拓者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的德米尔热纳伯爵埋怨说，英国大使斯托蒙特勋爵知道美国人在巴黎的每一个行动。一度在伦敦担任美国代表的阿瑟·李尖锐地指出，在富兰克林的巴黎使馆里，没有采取任何保密措施，“仆人、陌生人，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自由出入，他们常常在我们谈话的时候走进屋来……有关文件就摊在人们常去的公用房间里”。

在美国大使馆内，有一个由爱德华·班克洛夫特组织的英国情报小组，此人是富兰克林的主要助手和朋友，他把从主人那里得来的全部情报直接交给英国人。白厅不仅了解美国的全部秘密，而且连法国的好多情报也知道，因为法国人

信任富兰克林，告诉他许多事情。人们也许会说，富兰克林是被他的助手骗了，至于保密方面的问题，他仅仅是失职罢了。但是，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富兰克林的性格，就会否定这个看法。富兰克林的阅历很广，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干练的行政官员；他老于世故，谙熟各种阴谋诡计；他禀性谨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人们经常警告他，他的使馆有泄密问题。不能想象他会不知道所发生的事情。这些情报的大部分，实际上泄露出去的多数情报，都是有关海军事务的。这些活动以及富兰克林同英国人的私下交易，都确保了他在伦敦享有很高的地位，一旦美国打不赢这场战争时，他在英国人中的影响仍然会是相当大的。这一章是讲西方各国的海军情报工作如何从一种几乎是永久的敌对状态慢慢地转变为宽容的中立主义的过程。早在这种中立主义出现之前，富兰克林就是其热心的倡导者。

爱德华·班克洛夫特是英国在法国的情报网中的关键人物。然而，要是没有富兰克林提供的情报，他就一文不值了。从英国人每年给他一千英镑津贴这件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对他是很重视的。班克洛夫特的情报一般是送给威默斯勋爵或萨福克勋爵。但是，富兰克林留下一些特别重要的情报亲自处理；或者是直接告诉英国大使，或者是绕弯转给威廉康布的福朗西斯骑士团的人。

在白金汉郡休根登庄园一位名叫约翰·诺里斯的人的书信文件档案里，有这样一段神秘的记载：“一七七八年六月三日，此日用日光信号器传送了巴黎的富兰克林博士给威廉康布的情报。”诺里斯在萨里地区坎伯里的一座小山上，修建了一个高一百英尺的塔。他常从这个塔顶用日光信号器向西威廉